

“系统-生活世界”视域下大模型时代的全球秩序

——GPT 的霸权秩序与 DeepSeek 的全球协商化构建

叶文杰¹,高奇琦²

(1.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以 GPT 和 DeepSeek 为代表的 AI 大模型对全球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引入“系统-生活世界”理论对大模型进行分析,可揭示闭源霸权与开源协商两种技术路径对全球秩序的不同建构逻辑,实现该理论从现代性批判到全球数字秩序解析的范式拓展。以 GPT 为代表的闭源大模型不断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霸权,企图成为大模型时代的全球“数字系统”;而开源的 DeepSeek 则成为推动全球协商化构建的新兴技术力量,力图构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GPT 技术力图构建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和文化霸权,并消解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其技术训练路径对数据积累和算力储备提出非常高的要求,形成了一条垄断式的大模型发展之路。同时,AI 寡头企业通过 GPT 推动全球场域内的知识“单向涵化”,并促进知识帝国主义的再生产。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则是一种变革性力量,能够推动大模型的全球“共有、共治与共享”发展,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和协商化构建,在技术和文化“双重场域”构筑多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并构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关键词:大模型时代;GPT;DeepSeek;全球秩序;数字治理;系统;生活世界

GPT、DeepSeek 等大模型技术不仅革新了信息处理和知识生产的模式,也对全球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凭借 GPT 的技术优势,美国构建起对“他者”的技术与文化霸权。与之不同的是,DeepSeek 作为开源大模型能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共享与文化交互,内在地具有抵抗 GPT 霸权的力量,并推动全球秩序的协商化构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作为闭源大模型的 GPT 和作为开源大模型的 DeepSeek 如何影响全球秩序。为此,引入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理论,以此揭示闭源霸权与开源协商两种技术路径对全球秩序的不同建构逻辑:一方面,该理论将社会划分为由经济和行政权力

主导的“系统”与强调交往和共识的“生活世界”。其中,“系统”以工具理性为运行逻辑,“系统”中的行动者通过各种手段实现自身的利益和目标;而“生活世界”则以交往理性为运转逻辑,其中的行动者通过沟通协商达成共识,实现社会整合。因此,“系统-生活世界”理论为剖析 GPT 如何通过闭源的技术霸权强化“系统”力量,以及 DeepSeek 如何通过开源共享构建协商化的“生活世界”提供了清晰视角。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强调“生活世界”对“系统”的抵抗和协商构建,这一观点与 DeepSeek 通过技术民主化挑战 GPT 霸权,并推动全球秩序的协商化构建高度契合。进言之,“系统-生活世

引用本文:叶文杰,高奇琦.“系统-生活世界”视域下大模型时代的全球秩序——GPT 的霸权秩序与 DeepSeek 的全球协商化构建[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5):137-14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021)

作者简介:叶文杰(2000—),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技政治学研究。E-mail:yewenjiewj@163.com

界”的分析框架能够更加深入地剖析 GPT 和 DeepSeek 对全球秩序建构的影响。

一、GPT 的全球“数字系统”与 DeepSeek 的全球“数字生活世界”构建

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系统”是工具理性支配的媒介化运作组织,其系统理论植根于对现代性的批判,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对社会整合的支配性作用。“系统”主要由经济与行政两大子系统构成,分别对应货币与权力两种媒介:经济系统通过资本积累与市场交换实现物质的再生产,而行政系统则依赖科层制与权力指令维持组织化秩序,二者共同以工具理性为轴心,将社会行动简化为效率最大化与功能优化的工具性计算^{[1]241-242}。这种系统整合模式虽能提升社会运行效率,却暗含对生活世界符号资源的侵蚀风险。

在哈贝马斯那里,“生活世界”是指由文化再生产、社会规范整合与个体社会化三重维度构成的交往实践场域,其作为行动者之间共享的解释框架与意义网络,为日常互动提供背景性共识与语言化的理解模式。具体而言,生活世界在文化层面涉及意义共享的符号知识库可为行动者提供意义图式、在社会层面通过价值规范协调主体间互动、在个性层面指向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认同机制。概言之,生活世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主体间的沟通行动构建交往理性,并实现自我的再生产,其合法性基础建立在多元主体达成共识的过程之中,并以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为目标^{[1]165-204}。进言之,“生活世界”既是交往行为的“信念储存库”,也是批判性反思的实践场域,与“系统”的工具理性逻辑形成鲜明张力。哈贝马斯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的货币与官僚系统的权力逐渐侵入生活世界的符号领域,导致文化商品化、规范官僚化与个性物化。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程瓦解了生活世界的主体间交往理性,导致个人意义丧失、生活规范解体与社会认同危机等病态^[2]。

以哈贝马斯的“系统-生活世界”理论观之,GPT 强化了美国在全球层面技术系统与文化系统的“数字系统”构建。凭借在数据积累

和算力储备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利用 GPT 在国际竞争中构建出技术霸权^[3],同时在知识生产和对话交互中也体现出较强的意识形态性^[4],并可能成为全球层面的“意识形态世界机器”^[5]。这两个“数字系统”成为全球性的支配力量,形成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与文化霸权:一方面,GPT 的研发与训练依托高度资本密集的算力基础设施,并形成资源壁垒与技术垄断。另一方面,GPT 的闭源属性使其知识生产过程成为黑箱,用户无法嵌入自身的知识库,只能被动接受 GPT 输出的“文化霸权”。GPT 在知识生产中将特定的价值取向编码为“客观”知识,进而完成对全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由此不仅瓦解了主体间通过商谈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更将技术理性凌驾于交往理性之上。技术系统以数据资源、算力储备、算法架构为媒介,文化系统则以符号编码与知识生产为载体,二者共同构成大模型时代 GPT 的全球支配性力量,使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从“制度化的组织压迫”转向“技术化的隐性规训”。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框架中,“生活世界”通过主体间的协商交往实现意义共享与共识达成。DeepSeek 的开源特性体现了生活世界的核心特征,即主体间的交往理性构建。首先,DeepSeek 的开源打破了技术系统的垄断性控制,使大模型从封闭的“技术黑箱”转化为可共享的全球公共资源,这与生活世界中文化共享的交往理性相契合。其次,全球用户通过 Ollama 等工具实现其本地部署,允许私有数据与向量数据库的深度嵌入。这种技术赋权使个体得以实现知识交互并构建主体间性,避免全球“数字系统”对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更为关键的是,向量数据库的语义检索机制通过高维向量空间中的相似性匹配,构建了多元主体间“视域融合”的技术具象化。这正是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交往行为中“共同语境”的数字化实现。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通过技术民主化与知识交互涵化,正在塑造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和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并推动全球秩序的协商化构建。

在 DeepSeek 爆火之前,Meta 公司的 Llama 是全球较为流行的开源大模型,而 Llama 与

DeepSeek 在开源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Llama 的授权协议虽然允许用户查看和修改代码,但设置了商业竞争性条款,用户可利用源代码训练规模更大的模型等;同时,小企业或个人可免费使用 Llama,但超大规模企业必须向 Meta 支付商业授权费用。相较而言,DeepSeek 采用的 MIT 开源协议则符合 OSI(开源倡议组织)界定的开源标准,其不设商业竞争限制条款,并赋予企业自由修改代码的权利。开发者对 DeepSeek 代码进行二次开发后仅需保留原始版权声明,便可基于其代码开发专属的闭源大模型。概言之,Llama 系列模型的开源属于源代码可用的“企业友好但有限开放”型策略,而 DeepSeek 则属于宽松型开源策略。可以看出,DeepSeek 比 Llama 系列模型的开放程度更高。因此,只有开源程度更彻底的 DeepSeek 才能成为推动全球秩序协商化的核心力量。

二、GPT 与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

GPT 所构建的算力、资金门槛与技术垄断,力图以资本逻辑巩固全球霸权秩序。算力、芯片的垄断和闭源机制是 GPT 作为全球“数字系统”的核心特征。GPT-4 训练需调用超 20 000 块英伟达 A100,单次训练成本约为 6 300 万美元^[6]。OpenAI 的这种“大力出奇迹”的训练模式会转化为技术霸权,试图彻底阻断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路径。同时,GPT 通过 API 接口巩固其技术霸权。按照每 1K 个 prompt token 收费 0.03 美元、每 1K 个生成响应 token 收费 0.06 美元的计价策略,其实质是将知识生产异化为可货币化流通的系统媒介。此外,GPT 的源代码、模型权重及训练数据并不对外公开,这直接阻碍了全球用户主体间性的深度发展,限制了交往理性的构建。

全球“数字系统”的霸权秩序表征为数字帝国主义,而数字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与资本积累为 GPT 的发展奠定了数据基础。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与以往帝国主义的形成具有类似进程,都经历了从原始积累阶段到资本积累阶段的转变。数字帝国主义的原始积累是霸权国在原有的政治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的基础上,以非经济力量为主要工具实现对全球数据的掠

夺和垄断。换言之,美国等科技强国通过“数字圈地运动”和“数据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推动日常生活生产的数字化和数据化,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数字垄断资本也向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等传统资本形态渗透,为下一步的数据剥削和资本积累奠定基础。在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积累阶段,发达国家和企业依靠数字资本的力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和剥削,实现数字平台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转变。跨国数字资本通过构建全球数据价值链的隐蔽性劳动剥削机制,将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劳动者纳入平台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体系。数字垄断资本借助算法霸权对数据劳动过程实施全景敞视规训,消解劳动者的主体性,并系统性遮蔽数据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创造过程。数字帝国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对数据的垄断性支配、在资本积累阶段则通过对数据劳动的隐蔽性剥削,共同为 GPT 的发展奠定数据基础。

在训练 GPT 的数据劳动过程中,其剥削也更为广泛和隐蔽。GPT 的预训练和微调过程需要大量数据,在预训练阶段,数据主要来源于网络和公开文本,这些数据通常是未标注的,但会经过清洗和去重处理以减少噪声。GPT 的微调阶段通常分为两步:第一步,通过监督微调(SFT)使用人工标注的高质量示例数据;第二步,通过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构建奖励模型,并利用强化学习优化模型输出,使其更符合人类价值观。人工数据标注类工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且薪资低廉,往往由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承担,这些劳动者被称为“数据标注师”。“数据标注师”的工作与以往的雇佣劳动不同,这是因为,企业不再需要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线上的众包平台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劳动者与劳动力市场连接起来^[7]。尽管这种连接会产生规模效应,但这种规模效应是针对技术企业而言的。这种劳动形式将劳动过程分解为原子化的指令单元,既消解了劳动者建立共识的交往基础,又通过算法协议将人类劳动降格为纯粹工具性行动,这便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体现。在空间上,分散的劳动者无法形成真正的自为共同体,这是由于进行数据标注的劳动者依然与生产资料完全分离,其

所标注和处理的数据并非为自己所有,而是被 OpenAI 等寡头企业所垄断。这些寡头企业不仅占有数据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还利用这些数据支配劳动者。因此,GPT 的训练过程也就产生了劳动异化。

同时,用户在使用 GPT 时的非劳动行为也产生异化。数据在经过科技寡头企业的加工后,重新成为商品或数字应用出现在用户的电子产品中。用户在使用 GPT 时会产生数据,这些数据被科技寡头企业无偿占有,进而转化成预训练和微调所需的数据,可能会被售卖给广告商。用户的这种非劳动行为被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视为“数字劳动”,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又会被转化为一种“数据商品”^[8]。进言之,用户的知识贡献被转化为训练数据,这些数据不再是主体间商谈交往的价值符号,而是被异化为技术系统自我增殖的工具。同时,GPT 本身具有多模态性、生成性和交互性等特征,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被收集到更加丰富且涉及隐私的信息,这些信息会使 GPT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符合用户的偏好,用户则会对其产生内在依赖性。这便可能导致“数字拜物教”^[9]或“智能拜物教”^[10]的出现,增强全球场域中数据劳动剥削的隐蔽性,并进一步再生产全球“数字系统”的技术霸权。

GPT 所构建的全球数字系统还体现在算力领域。美国人工智能寡头企业通过掌控高性能计算设施,不断强化全球层面的算力壁垒。算力垄断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美国对高性能芯片的封锁,2022 年以来,美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有关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英伟达的对华销售一直受到美国政府限制。由于无法向中国市场提供 A100 和 H100 芯片,为此,英伟达专门为中国市场提供符合美方规定的 A800 和 H800 芯片,以此绕开美国政府的管制。此后,美国商务部又发布一系列新的芯片出口限制,扩大对高级人工智能芯片的定义,并对运往 40 多个国家的芯片产品提出额外的许可要求,以避免转售给中国。在严苛的限制条件下,英伟达针对中国市场的特供版 H800、A800 两款芯片也面临禁售。这种技术霸权策略揭示了哈贝马斯所指认的“系统”的“理性暴政”。美国

的国家行政系统所颁布的芯片禁令,形成强大的工具理性力量,试图不断巩固原有“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进言之,美国构建的算力垄断和壁垒不仅加剧了技术鸿沟,还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数字经济中的自主发展能力^[11]。

算力垄断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算力租赁平台”的兴起。算力租赁平台是基于云计算的数字基础设施,该平台通过整合全球各地的计算资源,为用户提供弹性、按需的 GPU 等算力,使用户可以高效分配和管理大规模的计算任务^[12]。科技寡头企业通过向全球用户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将算力作为商品化的租赁资源输出给技术能力较弱的地区和企业。以 Microsoft Azure 算力租赁平台为例,其提供了虚拟机、GPU 云服务和机器学习平台,支持用户灵活使用高性能计算资源。Google Cloud Platform(GCP)同样是全球算力租赁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其提供的 Compute Engine 和 Tensor Processing Unit(TPU)服务专为高强度的人工智能训练任务设计^[13]。这些算力资源被抽象为可交易的系统媒介,技术寡头则通过标准化接口消弭了全球劳动分工的交往理性。云平台的算法协议将主体之间的技术协作异化为单向度的服务契约,使技术弱势方在系统的理性支配下丧失知识生产的对话交往资格。同时,这种租赁模式使得技术能力较弱的国家和地区更加依赖技术强国提供的算力服务,从而不断构筑霸权化的全球“数字系统”。

西方国家采取行动来抵制或限制 DeepSeek 的使用,也体现出其技术霸权:澳大利亚当地时间 2025 年 2 月 4 日,其内政部长托尼·伯克签署的一份“强制性指令”,要求任何政府实体不得在任何政府系统或设备上使用或安装 DeepSeek 产品、应用程序和网络服务,并删除任何已安装的内容^[14]。美国当地时间 2025 年 2 月 6 日,两名美国两党众议员以国家安全为由,提交议案,呼吁在联邦设备禁止使用 DeepSeek^[15]。这些西方国家通过宏观的话语叙事和政策制定,将 DeepSeek 视为数据主权威胁,试图以行政手段限制其对本国公共部门的影响,这反映了其对中国技术发展的战略性遏

制,实际上也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全球技术霸权。

三、GPT 与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

GPT 在巩固全球“数字系统”技术霸权的过程中,同步催生出了文化霸权:一方面,科技强国利用 GPT 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将本国的文化与价值观进行弥散式传播;另一方面,GPT 将知识生产从“学术精英”延伸至“大众生活”场域,进一步巩固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GPT 所构筑的文化霸权实际上是“权力生产知识,知识再生产权力”^[16]这一逻辑在全球数字场域的具体表征。

科技寡头利用 GPT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知识的单向涵化是指一种文化体系中的知识单向影响另一种文化体系中的知识生产,强调知识的单向学习和借鉴^[17]。在大模型时代,单向涵化意味着发达国家将其文化理念、价值观和知识体系通过 GPT 等技术进行弥散式传播,逐渐影响并试图取代其他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单向涵化在 GPT 的训练和日常使用中得以实现,如公开资料表明,GPT-3 训练所使用的语料主要来源于 Common Crawl 数据集(网页爬取语料)、Reddit 平台(社交媒体平台语料)、英文 Wikipedia(百科语料)、GitHub(代码语料)及其他书籍和期刊数据,这些语料以英文为主。目前用于大模型预训练的主流语料库中,中文语料的总量占比和质量都较低^[18],这些语料库被用于 GPT 等大模型的预训练后,将会影响大模型生成内容的“意识形态”性^[19],进而影响大模型与人类的价值对齐。同时,GPT 在与用户的交互中,其生成的内容可能会塑造或改变用户的认知和思维模式。具体而言,GPT 能够引导用户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行为产生积极的情绪反应,最终达到操控用户认知的目的^[20]。进言之,发达国家的大模型寡头企业掌握了全球知识的阐释权,并试图逐步塑造全球用户的认知图式。可以看出,GPT 无法实现真正的价值对齐,即无法实现“赋予机器的目标就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标”^[21],更无法实现大模型“以人类福祉为中心,并与社会价值观和伦理原则保持一致”^[22]。换

言之,GPT 所对齐的很可能只是西方的霸权价值观。海德格尔认为,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具有“被抛性”,即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并非从零开始理解世界,而是始终处于一个被预先给予的意义网络之中^[23],而 GPT 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便体现了其知识生产的“被抛性”。

GPT 在促进知识单向涵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科技寡头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霸权。随着 GPT 技术的不断革新并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性知识、文化和语言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知识体系,这种知识的单向涵化会形成全球数字空间中的文化霸权。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文化霸权指的是某权力集团通过思想、道德和教育等方式获得其他集团的认同和主动服从。其他集团便会自觉融入该权力集团所构建的权力结构,并受该权力集团控制^[24]。进言之,在 GPT 加速推动知识单向涵化的进程中,并未形成平等的全球知识交互,某些强权国家通过 GPT 进行意识形态的弥散式传播,推动其价值与文化观念成为全球的主流思想,而其他国家则须“主动”融入该强权国家所构建的世界权力结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文化支配机制是“系统媒介”对“交往行动”的替代,技术寡头会通过数据垄断将交往理性异化为技术霸权。GPT 输出结果的“客观性”表象掩盖了训练数据中潜藏的价值偏向,进言之,GPT 训练数据的筛选逻辑与价值编码,本质上是“数字系统”对多元文化主体话语权的消解,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面临的不仅是技术代差,更是文明解释权被系统性剥夺的认知危机。

GPT 将知识生产从“精英学术”扩展至“大众生活”场域,进而再生产全球层面的知识帝国主义。相较于以往的数字技术,GPT 等大模型的重要特点就是能够赋能大众用户直接进行知识生产。知识在本质上蕴含着文化价值与观念,由此,知识帝国主义实际也是一种以“知识为媒介”的文化帝国主义。赫伯特·席勒是“文化帝国主义”术语的提出者,其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被吸纳进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或是被吸引,或是被强制,或是被贿赂,而使自身的社会体制适应于或

是有助于该支配体系中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25]。文化帝国主义需要通过媒介,将霸权国家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进行弥散性输出。以往的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国家通过学术、文学和媒体等媒介,运用学术精英话语对“东方”的落后形象进行一系列的话语建构^[26],因此,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实际上更多体现为一种“学术帝国主义”^{①[27]}。而 GPT 则将知识生产从“精英学术”场域延伸到“大众生活”场域,构建出内化于大众的“知识帝国主义”,并形成了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GPT 通过赋能大众进行知识生产,让用户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在需求,从而推动更加深入的“内在的媒介化”。深入的“内在的媒介化”将使得人们更容易内化 GPT 的价值倾向与意识形态^[28],该媒介化进程实际是技术寡头通过控制算法架构与数据的价值偏好,将交往行动重构为单向度的语义输出。大众在利用 GPT 进行知识生产的同时,也被生产出的“被抛性”知识所操控,使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间“沟通行动”沦为“数字系统”自我复制的工具,这不仅标志着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进入认知维度,更暴露出系统理性对主体间性的深度消解。

四、DeepSeek 与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技术共有、共治、共享

与“大力出奇迹”的 GPT 不同,DeepSeek 开辟了一条“小力出奇迹”的大模型发展路径^②。DeepSeek 模型在训练时使用了 GRPO (Group Relative Policy Optimization) 算法,该算法不依赖外部评估器来指导强化学习,而是通过对比一组回答之间的相对优劣,从而优化模型的性能。这种相对评估机制不仅简化了训练过程,还大幅提高了效率。同时,DeepSeek 还创新性地结合了混合专家 (Mixture of Experts, MoE) 框架和多头潜在注意力机制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MLA)。具体而言,DeepSeek 采用了 MoE 框架中稀疏激活的动态路由机制,并通过优化专家的设计和分布,显著降低了运行成本并提升了计算效率。MLA 机制则通过引入潜在变量,对键值矩阵进行低秩分解,这显著减少了其推理过程对 KV 缓存的需求,有效

降低了模型的显存占用。这些技术的运用使 DeepSeek 显著降低了训练成本(训练成本约为 550 万美元,不到 GPT-4o 的十分之一),这为后续其他大模型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发展路径,能够推动大模型领域的技术平权。

DeepSeek 能够创建“全球共有、全球共治、全球共享”的大模型发展路径,包含共享技术资源、构建全球协商共治体系、实现技术红利普惠等,这可以突破技术强国和科技寡头企业对大模型技术的垄断,并推动全球 AI 治理的民主化和协商化。进言之,DeepSeek 能够促进全球多元主体间交往理性的发展,进而构筑全球数字生活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技术能力建设,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中国贡献。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29]作为造福人类的全球 AI 公共产品,DeepSeek 是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促进全球协商合作的中国力量。

DeepSeek 的开源可以促进 AI 技术资源的“全球共有”。DeepSeek 所开创的“小力出奇迹”路径极大提升了大模型训练的效率,并有效降低了算力需求和资金成本。具体而言,DeepSeek 通过融合 GRPO 算法、MoE 架构、MLA 机制等技术,有效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算力资源的边际效用,其发展模式为技术后发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迁移学习路径,有效突破了 AI 寡头的技术壁垒。同时,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还能为全球技术人才提供较为平等的技术

① 一般而言,在现有的中文文献中,“知识帝国主义”与“学术帝国主义”所对应的英文都是“intellectual imperialism”。但为了突出 GPT 等大模型对大众知识生产的影响,并进一步将“知识帝国主义”内化于大众,本研究将以往学术精英所建构的“intellectual imperialism”译为“学术帝国主义”,将 GPT 构建的“intellectual imperialism”译为“知识帝国主义”。

② GPT 的“大力出奇迹”发展路径指的是其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和超大规模参数的堆砌,从而在语言、图片等多模态领域达到了意想不到的理解和生成能力,这背后实际是极其高额的资金投入和算力累积。但 DeepSeek 则通过训练流程和技术上的创新,在资金和算力有限的情境下也实现了优异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这便是其“小力出奇迹”的大模型发展路径。

创新与应用机会,并形成多样化的大模型发展与应用生态。多元主体在全球开发者社区中进行沟通和创新,可将算力资源从私有化生产要素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此外,借助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优化算力成本,技术强国可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为技术弱国提供相应的算力云服务。进言之,DeepSeek 所构建的技术民主化赋权模式体现了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中主体间性的交互性原则。多元主体通过协商机制构建全球大模型发展的规范框架^[30],使算力等技术资源的分配超越了工具理性主导的零和博弈,构筑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权利拓扑结构和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为人工智能“全球共治”提供了技术可行性基础,通过降低技术扩散壁垒,其可使发展中国家参与大模型全球治理体系的建构。多元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来调整开源大模型的源代码与训练数据,并进行本地部署,这不仅保障了国家的技术主权,还能够有效降低系统性的安全风险。DeepSeek 的技术赋权使国际社会能够突破传统“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路径依赖,从而构建大模型全球治理的协商化格局,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从“治平异构”过渡到“治平同构”^[31],实现全球治理的扁平化发展^[32]。同时,DeepSeek 的技术开源也实现了全球知识权力的再平衡,由此不仅维护了大模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也遏制了 GPT 的全球技术霸权扩张^[33]。进言之,DeepSeek 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从全球 AI 治理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规则共建者”,这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在大模型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并有效抵御了技术系统对全球公共领域的殖民化侵蚀。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也推动了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全球共享”,由此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建设。首先,开源大模型解构了闭源大模型的技术垄断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科技企业能够学习并应用前沿的训练数据和训练路径,这种知识扩散机制打破了原先的技术霸权,发展中国家的 AI 用户也能学习到前沿的大模型算法、源代码及模型训练路径。其次,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发展逐步形成了

协同共享的全球开发者生态,这构筑了多中心化的技术发展路径。技术弱国的 AI 用户能够通过代码分叉、模型微调等方式实现大模型的本土化调适,从而促进本国的 AI 发展与多元化应用。同时,开源大模型推动的技术民主化降低了 AI 研发的边际成本,并通过知识共享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最后,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赋能下,技术弱国作为全球 AI 发展中的不利者身份也得到了改良。进言之,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作为全球技术公共物品,通过技术权利的重新配置改变了 AI 发展的主导逻辑,即从资本驱动的技术霸权转变为多边发展的全球智能共同体建构,从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红利的“全球共享”。

DeepSeek 赋能国际多元主体间的协商沟通与交往,构筑了交往理性,并促进了大模型技术发展的全球共有、共治和共享,具体体现为多元化、包容性的治理理念和多元共享的治理结构^[34]。DeepSeek 可以构建全球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并构筑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吉尔·德勒兹视域中“一”与“多”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大模型时代的全球秩序:“一”对应着“树形结构”“界域化”和“纹理空间”等概念,这些概念对应着中心化、封闭化和静态性等强秩序特征;“多”则对应着“根茎模式”“解域化”和“平滑空间”等概念,这些概念具有去中心化、流动性和异质性的特征^{[35]1-34}。GPT 的闭源属性构筑了霸权式的知识权力体系,其核心技术资源被封装为不可解析的黑箱,形成了以西方科技寡头为中心的“树形结构”垄断,这种“一”的霸权模式通过算法殖民主义不断再生生产技术等级秩序与全球“数字系统”。

相较之下,DeepSeek 的开源实践则彰显出德勒兹意义上的“根茎模式”,这种“多”的全球协商化构建实际塑造了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形成了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同时,开源的 DeepSeek 通过促进全球开发者参与大模型发展的“解域化”运动,不仅消解了 GPT 的“界域性”技术权力,还推动全球秩序从“系统”向“生活世界”转型。原本被排除在技术霸权体系之外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通过 DeepSeek 的赋能而获得技术主体性,从而将全球治理模式

从垂直控制转向扁平协商。技术寡头主导的“一”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多”之间的张力,可以视为大模型时代“纹理空间”与“平滑空间”^{[35]683-722} 对抗的缩影。作为全球“数字系统”,闭源的 GPT 试图将全球用户纳入统一的等级秩序空间,而 DeepSeek 的开源生态则通过创造无数个本地化的“技术节点”,形成抵抗全球“数字系统”的“逃逸线”,并促进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构建。

五、DeepSeek 与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知识交互涵化

DeepSeek 是抵抗全球“数字系统”的重要他者力量,通过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反抗全球“数字系统”的文化霸权,并构建多元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发展中国家等国际行为体需要利用好 DeepSeek 等新兴技术力量,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全球数字生活世界的发展。

“交互涵化”是知识生产的高级形态,指“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深度融合,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知识体系^[17]。大模型的开源对全球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有着积极意义。具体而言,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模型权重和训练数据等知识要素可以被全球的研究者和开发者所使用和研究,不同国家的用户和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文化背景对其进行场景微调和应用,这一过程就会融入地方化的知识元素。这些地方化的知识也会作为训练数据反馈到大模型的全球知识体系,实现知识的交互涵化。在该进程中,源代码、模型权重和训练数据等数字语言便成为数字媒介,能够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交往,并构建交往理性和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同时,大模型技术的开源也可以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民主治理。具体而言,开源大模型的开发与应用具有民主化特征,这是由于其并非由单一的个体或组织进行操作,而是允许大众共同参与大模型的更新与应用^[36]。世界各地的大模型用户可以通过 GitHub 等平台分享并交流 DeepSeek 等大模型的源代码、训练数据等知识成果和本地部署等应用经验。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使不同地区、不同文

化背景的开发者可將本地化的知识融入大模型,从而促进多元知识体系的交互涵化。

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赋能下,多数国家和地区能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并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知识的交互涵化与共识的形成。多元主体所形成的共识可被视为约翰·罗尔斯所说的“重叠共识”,即公民虽然对正义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他们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可能导向相似的政治判断。这种相似的政治判断是“重叠的共识而非严格的共识”^[37],从而打破全球“数字系统”在文化霸权层面的结构性束缚,构建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全球开发者将在地化知识嵌入本地部署的 DeepSeek 时,实质上是在技术实践中展开“自身视域”与“他者视域”的诠释学对话,从而实现知识的交互涵化。大模型原有的知识结构作为“传统视域”,与地域化应用场景中的“当下视域”不断碰撞调适,这种交互涵化过程颠覆了 GPT 知识生产的单向传播模式,使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成为承载多元文化经验的媒介。同时,开源社区的协同机制更强化了视域融合的特征,如 GitHub 等平台构建的去中心化协作网络,创造了加达默尔所言的“效果历史”的生成场域,即“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38]。每个参与者在继承大模型既有知识体系的同时,通过上传代码、共享数据的方式将地方性知识注入技术系统。这种持续的知识迭代既非简单复制原始模型,亦非机械叠加异质元素,而是在技术中介作用下实现视域的融合与超越。换言之,开发者在调整模型参数时,不仅受既有知识框架的影响,还可通过创造性应用突破原有的认知边界。此外,技术民主化与视域融合的共生关系在此过程中也得到充分彰显。开源协议打破的知识垄断壁垒,消解了 GPT 知识权力结构中存在的视域等级,DeepSeek 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使每个文化主体都成为具有话语叙事权的对话者,通过技术媒介实现视域间的创造性转化。这既保留着原始模型的认知图式,又内化着全球开发者的多元智慧,成为大模型时代“效果历史”的技术化呈现。

同时,DeepSeek 在促进知识交互涵化的同时,也在构建全球知识生产的“小叙事”。GPT

所构建的文化霸权可以被视为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元叙事”。“元叙事”指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宏大叙事框架,旨在为社会的知识、制度和价值观提供统一解释与终极目标^{[39]3-8}。然而,“元叙事”的本质是权力与知识的合谋,并且隐藏了话语背后的控制机制。而 DeepSeek 则是一种“小叙事”,即强调知识的差异和多元性^{[39]213-214}。具体而言,对大模型有特殊需求的用户可使用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进行本地部署,在此基础上,用户也可以通过 LangChain、RAG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等技术工具进行相对便利的大模型扩展应用,增强大模型在实际业务场景中的应用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大模型的开源运动能够让用户将自身的真实价值偏好嵌入大模型,并推进技术的民主化参与和多元知识的融合交互^[40]。DeepSeek 可以促进多元文化间的沟通协商和知识交互涵化,成为构筑全球交往理性的平台,其可以变革 GPT 大模型所构建的高度同质化的全球数字空间,构建更加平等、民主、协商的全球数字生活世界。

最后,多元主体之间的知识“交互涵化”还可以促进全球主义的形成。全球主义强调全球治理的主体是相互依存的人类整体而非单个的人类个体,倡导全球范围内多元行为体的合作交流并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41]。这也可被视为多元主体在全球场域中进行沟通交往并实现社会整合,从而构筑全球层面的“生活世界”。由此可知,全球主义的实现伴随着多元主体间的信念共享、文化交互和交往理性的构建。在大模型时代,全球主义的形成需重视国家的力量^[42],这是因为 GPT 在全球扩张时会强化其霸权,进而加剧欧美等技术强国在全球场域的支配效应。因此,发展中国家需通过内在的团结,形成能够保护自身国家利益、知识生产权利以及文化特性的大模型力量^[43]。开源的 DeepSeek 通过促进知识的交互涵化,让发展中国家塑造自身的知识主体性和文化话语权,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多元主体间的平等协商,从而形成全球主义的世界格局。同时,美国等霸权国会通过 GPT 技术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

并企图将自身的利益合法化为虚假的“人类共同利益”。多元国际行为体通过对 DeepSeek 等开源大模型的本地部署以及向量数据库的嵌入,不仅能实现多元文化间的知识交互涵化,还能促进多元主体间的信念共享,这能够在全球层面促进“数字生活世界”的构筑,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利益”。

六、结 语

GPT 等闭源大模型强化了技术强国和 AI 寡头企业在全球范围的技术霸权,同时在全球场域内不断进行知识的单向涵化,并再生产知识帝国主义,从而构建全球文化霸权。全球数字空间的治理需超越单极化的垄断模式,向更加民主化、多边化的协商机制迈进。作为技术民主化的重要力量,DeepSeek 能够推动全球“共有、共治、共享”的大模型发展路径,其能够打破技术强国和寡头企业的单向控制,推动资源、知识和技术红利的全球普惠。同时,DeepSeek 等大模型的开源也能促进全球数字空间的知识交互涵化,抵抗全球“数字系统”的扩张。在该进程中,多主体间形成了交往理性,并构建协商化的全球数字空间和“数字生活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与“生活世界”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既要看到作为系统的社会,也要看到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GPT 代表的数字系统强化了全球霸权秩序中的技术调控,却遮蔽了文化再生产的民主诉求。DeepSeek 构建的数字生活世界彰显了交往理性的规范价值,但需防范技术民主化可能引发的系统失序风险。正如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需实现某种平衡,才能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全球数字系统”与“全球数字生活世界”同样需要实现某种均衡状态,从而促进全球秩序协商化的渐进性发展。

参考文献:

- [1]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M]. 洪佩郁,蔺青,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2] 安德鲁·埃德加.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M]. 杨礼银,朱松峰,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0-22.

- [3] 戚凯. ChatGPT与数字时代的国际竞争[J]. 国际论坛, 2023, 25(4): 3-23.
- [4] 王金良, 叶文杰.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 ChatGPT时代的权力悖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2): 171-182.
- [5] 张生. ChatGPT: 褶子、词典、逻辑与意识形态功能[J]. 传媒观察, 2023(3): 42-47.
- [6] PATEL D, WONG G. GPT-4 Architecture, Infrastructure, Training Dataset, Costs, Vision, MoE [EB/OL]. (2023-07-10) [2025-02-21]. <https://semianalysis.com/2023/07/10/gpt-4-architecture-infrastructure/>.
- [7] 胡莹. 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线众包平台劳工的劳动过程[J].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23(2): 93-104.
- [8] FUCHS C. Karl Marx and the study of media and culture today[J]. Culture Unbound, 2014, 6: 39-76.
- [9] 蒋红, 张国栋. 论数字经济中“数字拜物教”与“数字剥削”的本质——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J]. 社会主义研究, 2023(5): 55-62.
- [10] 蓝江. 从智能拜物教到算法价值——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内在矛盾[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3(5): 15-23.
- [11] KWET M. Digital colonialism: US empire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J]. Race & Class, 2019, 60(4): 3-26.
- [12] BUYYA R, YEO C S, VENUGOPAL S, et al. Cloud computing and emerging IT platforms: vision, hype, and reality for delivering computing as the 5th utility [J].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2009, 25(6): 599-616.
- [13] OUDA G K. Cloud computing service providers: a comparative study[J]. Samarra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Science, 2020, 2(1): 76-89.
- [14] 观察者网. 澳大利亚禁止政府系统和设备使用 DeepSeek, 澳部长辩称: 不是针对中国[EB/OL]. (2025-02-05) [2025-02-24].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02_05_764027.shtml.
- [15] 观察者网. 美国议员提议禁止 DeepSeek 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因为我们输不起”[EB/OL]. (2025-02-07) [2025-02-24].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5_02_07_764261.shtml.
- [16] MICHEL F.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215-237.
- [17] 秦亚青. 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1): 3-24.
- [18] 张凌寒. 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大模型中文训练数据语料库[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4(13): 57-71.
- [19] MOTOKI F, NETO V P, RODRIGUES V. More human than human: measuring ChatGPT political bias[J]. Public Choice, 2024, 198: 3-23.
- [20] 曾庆鸣, 毛维准. 认知武器化与人工智能认知战——一项机器学习与行为实验研究[J]. 国际安全研究, 2024, 42(5): 49-80.
- [21] WIENER N. Some moral and technical consequences of automation: as machines learn they may develop unforeseen strategies at rates that baffle their programmers[J]. Science, 1960, 131(3410): 1355-1358.
- [22] DIGNUM V.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to develop and use AI in a responsible way [M].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2019: 2.
- [23]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22-228.
- [24]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 姜丽, 张跖,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7-64.
- [25] SCHILLER H I.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9.
- [26]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37-144.
- [27] ALATAS S H. Intellectual imperialism: definition, traits, and problems[J].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00, 28(1): 23-45.
- [28] 高奇琦. GPT技术下的深度媒介化、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J]. 现代出版, 2023(3): 28-38.
- [2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自立自强 突出应用导向 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5-04-27(01).
- [30] 薛澜, 赵静. 人工智能国际治理: 基于技术特性与议题属性的分析[J]. 国际经济评论, 2024(3): 52-69.
- [31] 丁煌, 吕嘉欣. 论全球治理的“理论赤字”及其纾解[J]. 南京社会科学, 2024(8): 39-51.
- [32] 秦亚青. 全球治理趋向扁平[J]. 国际问题研究, 2021(5): 55-72.

[33] 高奇琦.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大模型共识性治理[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1): 48-58.

[34] 王正毅. 全球治理的政治逻辑及其挑战[J]. 探索与争鸣,2020(3): 5-8.

[35] 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M]. 姜宇辉,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36] 高奇琦,张皓森. 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 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5): 84-97.

[37]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M].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 387-388.

[38]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84.

[39]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M]. 车槿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0] VIDIVELLI S,RAMACHANDRAN M,DHARUNBALAJI A. Efficiency-driven custom chatbot development: unleashing langchain, RAG, and performance-optimized LLM fusion[J]. Computers, Materials & Continua,2024,80(2): 2423-2442.

[41] 蔡拓. 世界主义的新视角: 从个体主义走向全球主义[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9): 15-36.

[42] 蔡拓. 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理论与价值选择[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10): 4-29.

[43] 高奇琦. 大模型时代的复合平等与国家主权——从沃尔泽出发的思考[J]. 天津社会科学,2024(1): 39-47.

Global Order in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ystem-Lifeworld”: GPT’s Hegemonic Order and DeepSeek’s Globally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YE Wenjie¹, GAO Qiqi² (1. School of Government,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AI large-scale models, exemplified by GPT and DeepSeek,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order. Extending the “system-lifeworld” theory to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s not only uncovers how the two technological trajectories of closed-source hegemony and open-source cooperation differently construct the global order, but also achieves a paradigmatic shift of the theory from a critique of modernity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lobal digital order. Closed-source large models epitomized by GPT are progressively reinforcing U. S. -centric global hegemony, seeking to establish a worldwide “digital System”. Conversely, open-source counterparts like DeepSeek emerge as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ical forces facilitating globally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thereby endeavoring to shape a global “digital lifeworld”. The GPT technology endeavors to construct a global “digital system” that consolidate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hegemony, while eroding the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mong pluralistic actors within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s. Its technical training paradigm imposes exceptionally high demands for data accumulation and computational reserves, forging a monopolistic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for large-scale models. Concurrently, AI oligopolies leverage GPT to advance “uni-acculturation” of knowledge across global domains, thereby perpetuating th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mperialism. DeepSeek, however, functions as a transformative force. DeepSeek facilitates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models towards “co-ownership, co-governance, and sharing”, promoting “trans-acculturation” of knowledge and negotiated construction within the global digital space. This fosters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mong pluralistic actors across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ual field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global “digital lifeworld”.

Key words: the era of large models; GPT; DeepSeek; global order;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lifeworld